



海峡文丛 [方彦富 主编]

H A I X I A W E N C O N G

“民族”与 八十年代的精神征候

练暑生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HAIXIA WENCONG

海 峡 文 丛

方彦富 主编

“民族”与 八十年代的精神征候

练暑生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与八十年代的精神征候 / 练暑生著. — 镇江 :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1. 5
(海峡文丛 / 方彦富主编)
ISBN 978-7-81130-223-3

I. ①民… II. ①练…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189 号

“民族”与八十年代的精神征候

丛书策划/芮月英

丛书主编/方彦富

著 者/练暑生

责任编辑/林 卉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0890

传 真/0511-84446464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223-3

定 价/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自序

当代中国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话题。解释这个现代抑或后现代的“巨大装置”，其历史意义和文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让人困惑的问题是，我们身在其中，但却似乎找不到适当的词汇去描述这个庞然大物。自从中国遭遇现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进步与落后、“左”还是右，种种耳熟能详的词汇组合曾经很“有效”地改变着现代中国的前途。但是用之于描述我们当今的经验，却让我们疑虑重重。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人最基础的思维框架了。今天，重实践、重情感的传统或许能弥补唯理性化社会的不足，但是跨国公司、NGO、按利益分化的阶级及种种新出现的社群，跨越家庭、宗族、乡村等熟人社会，理性化的条文和契约无疑比实践经验能更有效地组织人群。我们也常说要打破传统，但是环境污染、垄断、阶级分化、区域不平衡、三农问题，这些困扰着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跟所谓“落后”的传统究竟有多大关系？至于货币、汇率、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背后，则更可以看到阶级与民族国家这两个大概念之间的分离与聚合，其中的关系盘根错节，可谓一言难尽。

这是一个庞杂的现实，那些曾经以对立并举的方式被使用的范畴，诸如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市场与非市场等汇聚其中，构成了一个混杂的世界。要言说这样的现实，寻找到一套崭新的词汇，当然是当务之急。不过，任何言说都无法离开我们既有的知识而疏理那些“旧”词，对我们现有的词汇表做一些整理，无疑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词汇不够了？这些词汇在何种意义上还能用于解释当

今？它们在今天的对话过程中还能呈现出哪些方面的内容？我想，搞清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出现言说的困难？为什么曾经有着巨大历史效力的词句，在今天却显得异常苍白？它们种种内在的可能和不可能究竟在什么地方？

说起当今的中国，我们通常会说 30 年的经验。这 30 年无论是分成两段来讨论，还是作为一个内在的统一体来分析，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0 世纪 80 年代的种种知识和视野深刻影响着 30 年来历史的走向。我们是带着这些词汇开始了 30 年的进程。这些词汇既是今天历史最近的源头，同时，也正是这些词汇的存在及其巨大的影响力导致了我们的言说的困难。回到 80 年代，对当年的种种知识做必要的整理，是今天的人们不可回避的工作。80 年代是一个走向开放的年代，文学当时领风气之先，个人写作、纯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学等范畴，在当年除了作为一个文学问题，还深刻影响着一个时代。因此，我的研究从文学这个角度切入，去重新打理当年的知识系列。

我将关切点放在“民族”这个概念上。这不只是因为，建设以“中华民族”为单位的民族国家是晚清遭遇现代性以来的基本任务，而且也是导致种种时代困惑的基本问题节点。被认为新启蒙的 20 世纪 80 年代也不例外。事实上，回顾当年种种新潮的概念，深究其提出的可能及其含义的变动范围，“民族”在其中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概念的分裂、内涵的模糊、思想的混乱，都或隐或显地与人们的“民族”意识相关，由此，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研究内容——“民族”与 80 年代的精神征候。这项研究从开题到完成，历经五年之久。最初是作为博士论文来写作的，从题目的确定到文章的写作，获得了指导老师南帆先生的精心指导。答辩和论文正式定稿过程还获得了孙绍振老师、颜纯均老师等诸多前辈学者的悉心指点。答辩主席王尧先生从本文定稿到整个答辩过程都作了精细的指导，提出了众多关键性的修改意见。可以说，正是在老师们的关心和指导下，本文才得以完成和最终定稿，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因为写作过程的时间跨度较长,在出版前,又对书稿作了一些补充和修订,对其中的表述做了许多修改。力图尽可能贴近自己变化中的想法,同时吸取当前学术领域的一些最新观点。尽管如此,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其中的疏漏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本书的出版,旨在抛砖引玉,吸取批评意见。此外,还衷心感谢闽江学院中文系和江苏大学出版社,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本书才得以顺利付梓。

目 录

自 序 001

绪 论

一、问 题 001

二、研究对象 007

三、“民族”意识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理论疆域 009

第一章 重写文学史的进程和问题背景

一、重写文学史的进程 016

二、“政治”和“非一体化”的文学史写作 024

第二章 “个人”的发生及“纯文学”的文学史如何可能

一、“个人”的发生及其存在形式 034

二、“纯文学”的文学史如何可能 046

第三章 文人和游荡在文学史中的浪漫精英

一、想象现代“知识分子”的方式 060

二、“孤独的浪漫精英” 069

三、在知识分子与文人之间 078

第四章 “民族”国家与被征用的“乡村”

一、阶级论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民” 092

二、被征用的“乡村” 102

三、“民族”国家与审美化的“乡村” 110

第五章 想象“世界”:民族的和现代的

一、“世界的”和“民族的”文学 122

二、作为文学“发展方向”的“现代派” 133

三、“人类普遍性”和新的文学史机制 141

第六章 文学史与作为“新中国”文学的现代文学

一、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传统 152

二、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的“颓废”与城市 157

三、三部文本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上海怀旧叙事” 167

四、后革命时代的想象空间 184

附 录 相关资料汇编 190

绪 论

一、问 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和激烈分化,包含在文学与历史关系框架下的一系列问题,如文学与阶级、文学与底层等问题重新走到了文学史的前台。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激动人心的“纯文学”、“个人写作”等概念也因此遭遇到新一轮的质疑和考量。如何理解 80 年代? 80 年代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学知识? 它的内在运作机制如何? 探讨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当前文学所面临的种种困惑、疑虑和企盼。

80 年代是一个活跃的年代。文学占时代风气之先,从创作、评论到研究都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各种思潮、方法和观念层出不穷。因此,讨论 80 年代的文学问题,有很多的切入点值得我们考虑。我的研究集中在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这条线上,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重写文学史”是 20 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之一。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文论的基本问题意识以及它的内在冲突,在“重写文学史”命题中有着密集的呈现。其二,“重写文学史”不仅是 80 年代文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而且还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 90 年代以来,从关于经典问题的争论、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直到当前比较盛行的对“左翼”作家的再评价,都可以看做“重写”问题的延续。因此,理解 80 年代文学知识体系及其内在运作机制,我认为,从“重写文学史”切入

是一条比较便捷的途径。

自从“重写文学史”问题提出以来,关于如何写作现代文学史的相关研究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应该不算过分。虽然至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但是人们至少在三个方面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第一,文学史不可能做到对文学史实的“真实”重现,文学史的写作过程同时也是对文学史料的阐释过程,因此,“前在”的经验——期待视野是文学史写作不可回避的内容。第二,文学史写作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行为,单纯在文学学科领域无法充分说明问题,权力和意识形态始终作用于文学史的写作过程。第三,中国现代文学不是一种抽象的文学,从它的诞生到演变,始终与中国现代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怎样的判断,“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始终包含着特定的政治文化含义。

这些共识构成了我们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命题的基本背景。近年来,在反思“纯文学”的思潮影响下,80 年代曾经深刻影响“重写文学史”过程的种种命题、概念和设想,经历了一场范围比较广泛的重估。比如,旷新年对 80 年代“纯文学”的分析,探讨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纯文学”、“个人写作”等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李杨对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谱系学分析,深刻揭示了“当代文学”与“五四”文学、“新时期”文学所共有的知识形式。通过这些分析和研究,那些在 80 年代看来似乎“不证自明”的东西,纷纷显露出其内在的缝隙以及它们产生于其中的知识的、历史的条件。这些研究结果极大地启发了我的研究,同时也留下了种种疑虑。也正是这些启发和疑虑激发了我对此作进一步研究的渴望。

80 年代是一个单纯而又庞杂的时代。说它单纯,是因为当年的人们对于时代的问题集中在哪里、该如何解决,似乎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人的解放”、“自由”、“个人化”等概念是当时人们分析当前、想象未来的基本路径。说它庞杂,是因为在这个渴求开放、多元的时代,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的外来知识蜂拥而至。尽管这些知识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是相互冲突,但它们似乎又“和谐”地统一在“新启蒙”的旗帜下。这种单纯而又庞杂的知识状况,使我在思考 80

年代的文学和文学史写作问题的时候,面临着重重困惑。因为,“纯文学”、“个人写作”等概念似乎是当年人们孜孜以求的文学理想,并引领着人们重新认识文学史。但是回顾“重写”的过程,我们无疑会发现:当年的人们在谈论、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它们的内涵又经常游离不定、模糊不清,甚至前后冲突。

这种知识状况与“五四”时期很相似。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汪晖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中,用“态度同一性”概念分析过这种现象。“五四”启蒙运动的内在于同一性,“不存在于各种观念的逻辑联系之中,而是存在于纷杂的观念背后,存在于表达这些相互歧义的‘观念’的心理冲动之中,也即存在于思想者的‘态度’之中”。“态度同一性”概念从启蒙主体的心理层面揭示了观念混杂而又能“和谐”统一的原因。在这种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诸如个人主义、文学的独立以及文学的现代化等命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载体,或者说一种混合体,里面包含着复杂、多元的因素。因此,单纯从这些概念本身出发进行分析,其实难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当年的文学知识的存在状况以及它们实际遭遇了怎样的困难、分化甚至重组。

我们知道,知识的边缘、意识形态的空白或缝隙并不是先验的存在。它们是中心、意识形态在确立自身的过程中排除出来的内容。因此,知识的中心与边缘、意识形态及其空白的关系其实是表现为一种结构的存在。这种结构关系,是否提供了一种从主体心理之外探讨当年知识混杂状况的可能性?比如,为什么当年“纯文学”、“个人写作”等概念能够包容复杂、多元甚至相互冲突的文学观念或知识?其与当年的主导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回顾80年代发生的众多文艺争论,诸如关于文艺的政治性、阶级性、自主性等问题,争论的焦点其实都不是单纯的理论立场的差别或者对于特定理论范畴的认识歧异,问题到了最后,几乎都会与国家这个巨大的身影发生关系,即涉及要不要贯彻国家意志以及如何贯彻国家意志。在一个国家意志企图将“历史全面国有化”的历史空间里,任何偏离国家意识形态需要的文艺表现都包含着潜在的破坏性。是否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条件下,导致“个人写作”概念成为能够包容各种混杂知识的接合点?也就是说,在意识

形态言说的普遍性、有效性层面上——“个人”话语已有效地接合了各种被“国家意识形态”排除的经验、知识或想象。是否也正是在这种由“国家”话语和“个人”话语组成的意识形态结构关系中,文学的独立、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的超越性等,这些与“纯文学”相关的各种范畴、命题,“抹平”了它们与“个人”话语的差异,甚至成为可以等同的观念?

诸如此类的疑问让我们看到,其实从知识或意识形态本身的内部关系出发,应该能够为我们打开一条思考当年文学知识多元混杂状况的途径。从个人主义成为有效的意识形态“接合”点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各种观念的内涵不能单纯从这些观念的起源、发生、演变这样顺时性的思路上去考虑。考察一种命题、观念在特定时空中实际发生的内涵和作用,必须考察这些观念与共时存在着的其他观念尤其是对立的观念之间的关系,这里面隐含着一种结构性的思考路径。也就是说,是否当年种种多元、混杂的观念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观念平台?它们实际发生的内涵和作用,是否存在于它们相互之间,尤其是存在于它们与革命文学话语这个巨大的他者的相互关系之中?从这个路径思考问题,我们会看到,如果说观念有自身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是否主要不是表现为其在时间上如何延续,而是时间上存续的观念在某个共时的平面中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这些关系不仅仅深刻限定了观念本身在特定时空中的意义,而且人们正是在这种关系当中理解、评判各种文学现象。

文学史写作作为一种历史书写,无法排除主观性因素的介入。说话主体前在的主观经验总是一个在场的内容。将这个前在的主观经验称作期待视野也好,意识形态也好,作为一个先在的因素,它总是影响着人们理解、解释文学史现象。我的研究计划采用的是“意识形态”概念。因为,前在的主观经验,作为一个先于说话主体的存在,劳动、权力和语言是其中不可回避的内容。而“意识形态”作为当前文化政治分析中的核心范畴,从马克思到阿尔都塞,虽然内涵不尽相同,但始终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历史内容的概念。意识形态作为主体言说的界限,规约着什么东西能够被说出,什么东西无法被言说。因此,意识形

态分析的重点不在于主体说出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说出的内容。从其边缘、空白、缝隙等排出的内容出发,可以帮助我们窥见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运作。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如何实现对知识的控制和对主体的规约,从而为我们打开更为丰富的观察和想象的视阈。这一点无疑是“文学”的文化政治分析的题中之意。

但是,对特定事物的意识形态言说作为主体言说能力本身,事实上也构造了能够被言说的“事实”。因为,意识形态作为主体思考、言说和想象世界不可避免的中介,一种陌生的事物如果无法和意识形态发生关联,事实上无法成为一种观念上的存在。因此,仅仅从意识形态的边缘、空隙出发,研究其作为权力话语的遮蔽作用,只是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工作部分。研究意识形态对于我们的生活和文学想象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必须考察一个问题,即陌生的或边缘的“事物”怎样成为能够被人们言说的“事实”。落实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比如,张爱玲是在什么样的观念条件下被言说?人们在评判张爱玲创作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如何消化、容纳这个作家?它遇到了哪些困难?经历了哪些分化和重组?哪些因素被淡化,哪些因素被突出?在经历了种种分化重组的过程中,它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弥合机制实现自我弥合?显然,这个过程不可能表现为某种观念单方面“战胜”或取代另一种观念,这里面隐含着各种观念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蔡翔在谈“何谓文学本身”的时候,曾经动情而又不无深刻地说道:“我一直怀念80年代,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但是时过境迁,新问题的提出,迫使文学进行新的叙事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决裂’的开始,所有的选择实际上都是在传统的延续中进行。”我们知道,当年在人的解放、现代化等启蒙主题下讲述文学的历史以及在这一主题下产生的文学的独立、个人的自由表达等命题并不是80年代的专利。“五四”以来,它们就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展开自我想象的基本机制。80年代的人们也是在其中开始了所谓“新启蒙”和“重写文学史”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传统。将其称作传统也好,意识形态也好,都表明这些源自于“五四”的文学想象机制,深刻塑造了现代中国人对于文学的

想象和期盼。它们跨时空的影响力,显示了强大的传承能力。它们在不同的情境经历分化、瓦解甚至重组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看做传统对历史作出不同回答的过程。因此,当我们今天身处新的历史情境,回望“五四”以来形成的各种文学经验、想象和期盼,该如何作出理解和评判?

提到这些问题,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历史情境。近年来,在重新评价“现代化”、“纯文学”包括“个人写作”等概念的过程中,人们的基本依托主要是在于历史情境。人们的看法通常是在承认这些概念曾经具有反抗价值的同时,立足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现实重新评估这些概念的意义。很显然,当我们今天身处新的历史情境,回望80年代“重写文学史”历程所表达出来的各种愿望和期盼及其所依托的各种文学观念,对他们展开捍卫或批判,都是我们直面当前、想象未来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其本身并不与情境一一对应,观念无疑有着自身的传承史。意识形态所制造的裂隙和空白正是在意识形态跨情境的传承过程中被不断放大或缩小,这是我们辨析其与历史情境关系的重要途径。因此,如果我们力图讨论这些观念曾经做过什么、目前正在做什么、它们在面临不同的情境过程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实现自我弥合的这些问题,除了要参照历史情境外,对观念本身的实际运行状况进行必要的辨析也是不可或缺的路向。

深入观念的内部思考它们之间的复杂关联,这种研究思路是一种观念学的思路。探讨的是观念自身的生发、传承历程。如果观念有自身的历史,那么观念自身的历程也将提供出一份自己的说明。此外,由于从历史情境出发研讨问题,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出于这些考虑,本文研究的重点没有放在历史情境这一边,而是力图从观念自身的传承史意义上,寻求单纯从历史情境出发,无法说明或者说被忽略的内容。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只有在超出特定观念自身,并把它们放入一个更大的关系平台背景下,我们才能走出捍卫和批判相对立的二分法所划定的思考界限,从而深入它们的内部,在它们之间的多元混杂的关系中,观察观念、知识之间碰撞、瓦解、分化、传

承、重组的进程。如果从1978年算起,“重写文学史”问题已经过去了30多年,如果将下限划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也有10年以上的时间。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正遭遇着不同的情境。时间和情境的距离使我们拥有了一个视点,得以暂时抽身其外,观察上述进程,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各种文学知识在当年遭遇了怎样的困难及作出了什么样的回答。

二、研究对象

为了让研究能够在—个比较明确的范围内进行,我计划把“重写文学史”放在1978—1989年这个时间段中来考察。1978年5月20日,《人民文学》发表了《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等—组文章,被认为是开启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先声。而以1989年作为结束,既有时代氛围的考虑,也有比较具体的原因。因为,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于1989年《上海文论》最后—期结束。

在这个时间历程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需要,表达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解和评判。虽然时间跨度并不是很长,提出的见解也多种多样,但却有着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我认为,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主要阶段:—是在“拨乱反正”时代主题下,否定了文革时期的“极左”文学史,恢复建立在“新民主主义”历史论述基础上的现代文学史观。其标志是—批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重新编订出版。二是在走向世界、文学现代化等命题下,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论述的改写,其标志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三是在反思文学政治化、工具化的文学命题的影响下,从纯文学包括个人写作等概念出发,重估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地位。其标志是“重写文学史”概念的明确提出。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其侧重点,但也有其相对统一的关切点——即在反思以“左翼”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史论述过程中,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个人、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讨论和重估。

在上述三个阶段所标出的“重写”主题中,还有一个命题也同样重要,即客观地研究文学史,还原所谓“文学史的本来面目”。这个“重写”命题从文艺界“拨乱反正”开始就受到重视。其基本标志是80年代前期,现代文学史史料整理工作的大规模展开以及一系列相关期刊、全集和工具书的出版发行。“还原历史真相”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那些被“极左”文学史所排除的作家、作品能够重新出现在文学史著中。由于“还原历史真相”是以“客观”、“科学”为旨归,所以,后来不仅延伸到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论述的反思,而且还成为现代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一个基本难题。因为,文学史的“科学性”不只是与“政治性”相对应的概念,它所对应的是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一切“主观”性内容。这就带来它与各种文学史写作设想的矛盾。虽然人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文学史无法做到对文学史现象的“客观”呈现,但作为一个问题意识始终贯穿在“重写”过程中。

另外,90年代初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一方面,“重写文学史”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愿望和观念,仍然有一个延续期,80年代提出的很多命题都在这一时期发酵。所以,本书的一些材料选择,会超出计划研究的时间段。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开始出现,80年代各种文学观念的短暂结盟开始走向分裂,一些以前无法看见的问题浮现出来,而另一些过去含义模糊的地方恰恰成为引起人们焦虑的根源。特别是以“后殖民批评”为代表的各种后现代文学、文化思潮开始影响中国的近现代研究。它们的主要标志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对“五四”以来形成的各种文学知识、文学想象进行了另一层面的反省。与此相应的是,近年来比较盛行的“文化研究”、新“左翼”文学批评以及与这些理论或多或少有着某种联系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开始比较直接地影响到国内的研究者。80年代人们关于文学和文化的一些集体想象开始出现松动。但是,由于这些知识、想象与80年代的文学观念是在不同的知识谱系中展开的内容,它的意义更多表现为开启后来的研究,而不是过去的延续。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把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最多只是在涉及相关问题时,将其作为一种参照。

比如,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对中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再解读。如果说它们与“重写文学史”有什么联系的话,应该看做是对“重写文学史”的再“重写”。此外,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是从“重写文学史”的过程切入,思考 80 年代文学史的观念和状况。研究材料的选择中心放在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言论。由于当年的“重写文学史”历程与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种种论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文的材料选择范围还将放大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

在研究材料的选择方面,“重写文学史”的过程和结果,主要体现在对经典作家进行重读,并借此重构文学史的经典谱系。我的研究集中在四位作家身上——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这四位作家在 1949 年以前都曾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949 年以后,他们有的被边缘化,有的甚至从文学史中消失。当然,“重写文学史”不仅仅是对这些曾经被边缘化的作家的重读,包括鲁迅和左翼作家也经历了一个被重新解读的过程。讨论新时期的文学观念结构,考察后者被重读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我认为,沿着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更有利于我们观察哪些新的元素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们如何进入并对现有的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冲击,人们由此经历了怎样的矛盾、困惑和徘徊。因此,我的研究中心没有放在鲁迅和“左翼”作家这边,而是从以前的边缘作家切入,考察他们被重新经典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意识接纳他们?其中,哪些因素被淡化?哪些因素变得重要起来?还有哪些因素则始终是一个权威的在场?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展开?又如何获得自身的“统一”性。

三、“民族”意识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理论疆域

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结构”不是此项研究能够完成的工作。我设想能从某个关节点切入,观察各种观念、知识的关系,并以此探究它们之间如何多元混杂,又如何“和谐”共处的状况。

我设想以“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为关节点入手。自梁启超提出“新小说”论以来,中国文学在中国人的“现代性”追求中开始承担了